

中短篇小说卷

前 记

从1972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今天，整整40多年了，时代背景，个人艺术趣味，都在不断变迁。编辑校对这部书稿，我遵从一个原则，只改错字，不动句子，保持原貌。

关于小说创作，有许多甜蜜与苦涩交织的回忆。1980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恢复后的首期学员，在京期间我喜欢上中国美术馆。有一次看一种人体画册，需要出示身份证件，我没带任何证件，随手掏出一张北京公共汽车月票。这时身后一位北京青年随即叫了一声：“刘富道，《眼镜》。”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那时一篇小说可以使人走红，满世界都有人知道你。

为什么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作品，那时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呢？

那时我们写小说，怀有一个信念：突破禁区。冒着风险突破禁区。当时的所谓禁区，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这就是我们一步步走过来的历史，由思想禁锢走向思想解放的历史。作家只要说出了大众心里憋着的一句话，就有人把你奉为神明。

1977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值班室值班，在我带去的文件夹里，有国务院领导人万里的讲话，他呼吁文艺工作者表现“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此前的“文化大革命”，专革文化的命，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所有文艺作品里的知识分子，都是受批判的对象。万里的一句话，点亮了我心中原有的一个构思，当晚就在值班室里写起了我的《眼镜》。一个星期后打印出来了，一位同事家住武汉大学，带了一份打印稿回家，就在珞珈山传开了。

爱情也曾是禁区。《眼镜》是新时期最早的爱情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爱情小说集》，也是新时期最早的爱情小说集，把这一篇排在了卷首。小说还有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场面，写了一个极左分子的代表人物“跳得高”，这在当时也是突破禁区。我当时想赶在《人民文学》1978年元月号发出来，后来看元月号上没有，就给编辑部打电话询问，王朝垠先生回话说，2月份发嘛，听口气有些生硬。后来我才知道这篇小说发出来并不容易。

《传记文学》1993年第3期上，有伍宇的文章《我与〈人民文学〉》，伍宇

原是《人民文学》的小说组长涂光群。他写道：“回想起来，那些对社会生活的
前进，对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短篇佳作的出世，……绝非一帆风顺
的。”“《眼镜》于1978年初被责任编辑推荐上来后，我予以肯定，对其幽默风
趣和湖北地方风味尤为欣赏。然而小说到了编辑部负责人那儿，他的批语是：
‘此作思想上艺术上均无可取。’这使我和责任编辑很纳闷，是退稿呢，还是争
取？我们觉得退了可惜。我只好向编辑部负责人申述了这篇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
可取之处，说打算修改（编辑修改）后予以发出。所谓‘编辑修改’，其实并没
有什么大的改动，是对编辑部负责人保全面子的妥协办法。小说终于在1978年
第2期顺利发出，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奖。”王朝垠先生来信特别说到，“这个作
品虽然在目录上排在第三题，但读者是作为头题来读的。”《眼镜》与我的另一
篇得奖小说《南湖月》一道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

在伤痕文学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南湖月》以幽默轻松的笔调出现，受到各
方重视，被收入多种小说年鉴和选本，并有英文、法文译介国外，也引发评论家
对我的小说的综合评论。田中全先生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展示生活固有的
亮色》，周迪荪先生在《长江文艺》发表文章《生活的十足的真实》。当时来函
商讨改编电影、电视剧、连环画事宜的有29处之多。《文艺报》编辑的刊物
《文艺情况》，发表过一篇关于重复改编的文章，统计表上《南湖月》被上海电
影制片厂、湖北电视台、大连电视台三处重复改编成功。前年还从网上购得一本
宁夏出版的《南湖月》连环画，当年我并不知情，如今想讨稿费也晚了。

写《南湖月》我做了一个尝试：一个全真实的街道工厂，一个虚构的爱情故
事。一个有趣的现象随之而来，有读者误以为是报告文学，以致青海省轻工业厅
找到武汉这个小厂，来做了一种产品的“中试”。

一直有个心愿，写实验小说，《布娃娃和不定性儿》和《直线加方块的韵
律》两个短篇，以及中篇《候鸟》，就是我得意的实验成果，代表了我那个时期
的创作倾向。1980年代之初，拿军事题材做试验，有相当大的风险。《布娃娃和
不定性儿》有过被北京某刊退稿的经历，而在它尚未完成之时，这家刊物的编辑
到我家里，趁我不备看到了，当时就要带走。这家刊物另一位编辑曾当面对我
说，它比我当时的一个得奖小说更好。

我对小说这种文体一向心怀敬畏。我曾写文章说过世界有一种智慧叫做小说
智慧。小说智慧，在小说形式里，在小说内容里，在小说语言里。我今天重读往
日写的小说，有时会会心一笑：我那时怎么那么聪明呀。

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我出过几本书，其中有三部长篇传记《天下第一
街·武汉汉正街》《汉阳事件·全纪实文本》《汉口徽商》。当最后一部尘埃落

定，有朋友问我再做什么，我的回答是：回到小说。

小说，你曾经令我着迷，你依然令我着迷。

我会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到小说吗？

修订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

关键时刻

高炮营打完了靶，回到了营房。沉静好长时间的军营，又充满了生气，清新的空气里，溶进了欢笑和歌声。

营长张大威在营区转了整整一天。各连宿舍，营修理室，车炮场，凡是他认为需要检查一下的地方，都走了一趟。他没有发现使他特别不满意的地方。部队拉回来才一天嘛，做了大量的工作：房子打扫了，路边边滋蔓的野草铲掉了，还有山坡上的菜地，该锄草的已开始锄草，该挖沟的正在挖沟。最使他满意的要数车炮场，满身尘土的车炮被擦洗得锃明发光，一门门高炮穿着整洁的炮衣，一台台牵引车披着草绿色篷布，一字儿摆开。这钢铁的队列，昂然肃立，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可以出动。“部队嘛，就要有这个劲，像个打仗的样子！”他脸上露出笑容。

“这能说明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常备不懈的思想牢固吗？”张大威在自己脑子里划了个圈圈，脸上本来就不显眼的笑容，像得到空袭警报，倏地躲藏起来，只有那些又粗又密的胡茬子挂在脸上。他还没有来得及打扫“个人卫生”呢。

张大威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单位的工作，可以说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无保留地满意过。因为他打过仗，闯过战火纷飞的年月，战争那玩意儿的突然性，他领教过。每当他检查战备工作，实在挑剔不出什么毛病的时候，总是这样想，一百人中间，会不会有一个人松懈麻痹；一百天中间，会不会有一天松懈麻痹？这是可能的。问题就可能恰恰出现在这一个人、这一天上！

夕阳把最后一片晚霞留在远远的山岭上，为蔚蓝的天空镶了一条橘红色的彩边。张大威望着浩瀚天空的绮丽景色，不禁感到肩上的担子更沉了。毛主席把祖国的天空交给我们守卫，任何狡猾的飞贼胆敢在我们头上撒野，定叫它有来无回！张大威想到党委关于深入进行战备教育，更加扎实地做好战备工作的决定，想到一个指挥员的责任，他决定住到三连去，具体地摸摸战士们回营房后的思想情况。

为啥到三连？这个，张营长心里自然有底。三连有个战士叫胡劲，是五班的一炮手，对操炮技术很有点儿研究，干起活来猛打猛冲，噼哩啪啦，不喜欢拖拖

拉拉。胡劲平时爱把“关键时刻”四个字挂在嘴边，引起了营长的注意。

“打炮无巧，抢二分，重三秒。”有一回，胡劲给新战士这么传经。

“啥是抢二分，啥是重三秒？”新战士问。

“就是说，两分钟要把目标捕捉到，瞄准镜的十字刻线要分毫不差地瞄准敌机，死死地盯住。敌机临空，三秒钟要把炮弹放出去。我上次不讲过吗，咱们炮兵是打分秒的，分秒必争。这二分、三秒，就是关键时刻。平时马虎点没啥，这三秒马虎点，敌机可就跑！”

“这关键时刻，就要看我们的了，是不是？”胡劲正讲得有声有色，不知道什么时候营长来了，接过了胡劲的话尾。

胡劲这人在首长面前从来不拘谨。他特别喜欢营长，喜欢听营长讲战例，讲打仗是啥滋味。胡劲见营长说起“关键时刻”，就来了个见缝插针，请求道：

“营长，把你那个‘关键时刻’的故事，给大伙讲讲吧！”

胡劲说的这个“关键时刻”，就是营长有一次端着枪和敌人拼刺，一口气干掉了七个敌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胡劲从老同志那里听过多次，他想，别人不管讲的多具体，也比不上营长亲自讲的生动。

可是，营长就是不讲。这回营长不是因为过于谦虚，他在认真思索一个问题，思索“关键时刻”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在营长脑子里，胡劲的确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的好战士。这次打靶，他亲眼看到胡劲两眼瞄出了血丝丝，一点也不含糊。五班有效弹迹为百分之百，每打一个航次，都打下了拖靶。撤出阵地那天，下着雨，车炮下山后要通过一段泥泞小路。为了安全起见，人都下车跟着走。五班的车拐弯时，车拐过去了，火炮右边的两个轮子悬了空，打着转转，泥星儿四溅。这种时候，不把轮子顶住，就要出现连炮带车滑到陡坎下的麻烦。胡劲眼尖心急，把手一挥，喊道：“同志们，关键时刻站出来！”说着，纵身跃到坎下，用肩膀死死顶住轮子。战士们也一起拥上来。两个悬空的炮轮，硬是从胡劲和战友们的肩上缓缓地爬上了路面。

张大威在向三连走的路上，一边回忆着胡劲在关键时刻的英勇形象，也想起自己的那个“关键时刻”。他想，那个故事有的战士讲得不完全，只知道自己怎样一口气干掉七个敌人的情节，却不知道就在这“关键时刻”，自己怎么挨了敌人的炸弹皮。此刻，他感觉到埋在腰部的炸弹皮蠕动着，一种隐痛爬上心头。他想，这个故事，一定要讲，一定要从头来讲。

张大威到了三连，只见胡劲右肩扛着一根十字镐的断木把，左手掂着镐头，从后面山上劳动回来。

“营长，这家伙回营房搞生产就闹起情绪来啦。”胡劲扬起镐把说，“还没使多大劲，就断了，要是在关键时刻，构筑工事，可抓瞎了！”

“嗯，我看哪，都像你胡劲那么蛮干，咱们后山栽了十来年的树，还不够做十字镐把用呢。”营长连说带笑地应着。他望着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一身的虎劲，仿佛想起什么，问胡劲：“你们班今天晚上干啥？”

“听你讲战例。”

“好家伙，你倒学会先发制人了！行，今天一定讲。”

营长说着朝连部走，胡劲高兴地回班里去。

胡劲回到班里，把镐头、镐把往门旮旯一放，就向全班宣布：“营长今晚给咱们讲战例！”接着他三下五除二地洗了洗手，擦了擦身子，便把班长和全班同志邀在一起，等营长来讲故事。可一直等到熄灯，也没见营长来。

夜，静静的，和平常一样。

胡劲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为啥营长老是不给我们讲他那个“关键时刻”？门轻轻地开了，胡劲知道是干部来查铺了。他又想起一个问题，为啥营长今天来咱们连里住？对了，可能要搞紧急集合！——不可能呀，部队刚回营房，又不是什么“关键时刻”……

“胡劲，快！准备战斗！”胡劲在睡梦中听见班长在喊，他以为天明了，睁眼一看，外面黑糊糊，一点亮光也没有。他睡得太熟了，连战斗的信号都没听见。

胡劲毕竟经过些场合，虽说醒得比别人晚，动作倒是挺麻利，呼啦一下跳下床，穿衣服，打背包，什么挎包水壶之类掂起就跑。跑到门口，他想起十字镐还撂在门旮旯呢，又敏捷地抓起镐头和镐把，朝怀里一抱，直冲车炮场。

车炮场上的气氛紧张而忙碌，然而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忙而不乱。这里，看不见一丝亮光，也听不到装具碰撞的声响，只有各级指挥员在迅速而认真地清点人数和器材，简短而准确地逐级向上报告。胡劲刚一上车，班长立即发出了“五班好”的报告词，车就挂挡开动了。

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云，月亮不知躲在哪儿云层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颗星星眨巴着眼睛。长长的车炮队列，全都闭着灯，在蜿蜒的公路上摸索前进。胡劲坐在车上，一边扣上衣的纽扣，一边想：“这是到哪儿去呢？关键时刻又到了吗？”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车炮停在起伏的山丘上。战斗演习开始了，信号从前面传来：准备战斗，迎击敌机。

像电流一样，信号迅速传到每个连，每门炮，每个人。火炮的牵引杆卸下了，四个轮子呼地离开了地面，方位角标定了，高低机、方向机迅速地运转起

来，炮身管像愤怒的手臂，忽上忽下地挥舞着。

又过了十分钟。传来营指挥所的命令：各炮就地构筑工事。派出观察员，严密监视空情，时刻准备战斗！

五班战士有的拿锹，有的拿镐，开始挖炮掩体。胡劲摸到自己的镐头和镐把，把镐把插进镐头里，也抡起来。哪知这镐把的粗棒头断了，上下一般粗，使劲一抡，咣当一声，镐头脱落了，碰得石块火星四射。

“糟糕，这关键时刻可抓瞎了！”胡劲嘴里咕嘟着，眼里冒着火。

胡劲掏出手帕，正要缠在镐把上，突然一只大手捉住了他，耳边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给你，快安上！”接着他模模糊糊地看见递过来一根木棍。他明白了。他又惊喜又内疚，嘴里冲出一句话：

“营长，你批评吧！这……”

“这关键时刻，快准备战斗！”

这木棍，是营长为胡劲准备的一根十字镐把。他到三连和干部们从傍晚一直座谈到深夜，又挨班查铺，在五班的门旮旯发现断了把的十字镐还在那里扔着，脑子里立刻蹦出两个问题：十字镐把断了，为啥不马上修好呢？哦，现在不是“关键时刻”！如果马上来个“关键时刻”呢，那不真来抓瞎了吗！想到这里，他找了一把刀，上营房后面的山坡去了。

张大威在连值班室里，刚把一根榆树干削成光溜溜的十字镐把，电话机突然急促地响起长短不寻常的铃声，他立即意识到只有师指挥所传达战斗命令时才用这样的信号。张大威从连值班员手里抓过话筒一听，正是参谋长找他的。上级命令，高炮营急速开赴老鸦岭，占领有利地形，投入战斗，迎击乘月黑头摸进来的敌侦察机。

事情就是这样意外，不是写文章的人故意写得突然，而是那些侵略者们惯于搞突然袭击。

夜，依然很静。火炮荫蔽在掩体内，只有炮身管伸长着脖子露在地面上，不时地缓缓移动。

胡劲双手紧紧握着方向机手柄，两眼透过瞄准镜在空中搜索目标。他心里明白，探照灯不到敌机临空的关键时刻是不会开灯的，他希望这个时刻赶快到来，打它个痛快。

敌机在灰色的云层里穿行。胡劲凭着一双机警的眼睛，辨别着云层里每一个可疑点。在远远的一团云里，有一个黑点移过来，胡劲转动方向机，对准了黑点，一步不拉地追随着它，并不时轻声念着“高一个密位，低一个密位”地关照着二炮手。一个密位，在瞄准镜的十字刻线上，只有一格格的十分之一，而瞄偏

这么一点，炮弹在高空就跟敌机差一大截子，那就不叫打敌机，只能叫吓唬敌机。用胡劲的话说，一个炮兵，不懂得一个密位的意义，就是不懂得一个战士的责任。敌机临空了，胡劲屏住了呼吸。突然，狡猾的敌机来了个急转弯，迂回而过，朝云层钻去。就在这一刹那间，探照灯刷地亮了，雪白雪白的光柱子平地竖起。在光柱的交点上，敌机现出了原形。就在三秒钟，不，就在一两秒钟里，胡劲左脚使劲踏紧变速器，双手果断利索地摇动方向机，整个炮盘旋转了九十度，瞄准镜的十字刻线，又分毫不差地架在敌机脑袋上。

“放！”营指挥所、连长、班长几乎同时发出了射击命令。

隆隆的炮声，震天撼地地响。飞出炮膛的炮弹，直插云层，硝烟在火光中升腾。

“停止射击！”

几百双眼睛的视线交汇在一个焦点上：狡猾的敌机拖着条大尾巴，向地面栽下来。

营指挥所的高音喇叭响了：“同志们！敌机被我们揍下了！”阵地上响起震天撼地的欢呼声。

胜利的喜悦，迎来了灿烂的朝霞。变幻莫测的云朵，被染得金黄绚烂，轻轻地舒卷着。墨绿色的火炮，庄严地屹立在起伏的山岭上。

张大威披着朝晖，攀过这座山，又登那个岭，检查着每一个炮位，他的脸色是庄重的，严峻的。汽车的剧烈颠簸，紧张的战斗，连日来又缺乏休息，他是够疲劳的了，但从他的脸上却看不出丝毫倦意。他一只手用力地撑住腰部，使身体微向后仰，显然，埋在腰部的弹片又在乘机捣乱了。身上的伤痛和阵地上的火药味，又激起他对战争年月的回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营长和胡劲这会儿一样，才当年把兵。他是现在三连的战士。那时国民党和我们签订了停战协定，部队驻扎在黄土岗，对面山头上就是国民党的步兵团，由于停战，也不开枪开炮。可是，一天清晨，忽然传来一阵尖厉的嗡嗡声，张大威还以为是来给国民党军队运送枪支弹药的运输机，哪知抬头一看，却是他们的轰炸机已经临空，说着就像一群黑乌鸦，向我阵地俯冲而来，炸弹像下雹子一样拼命往下扔，接着，对面山上的敌人也蜂拥而上。张大威端起枪，和敌人拼刺，一口气干掉了七个敌人。战斗结束后，他才感到腰痛，脱掉衣服一看，衬衣都被染红了。

以后每当张大威感到身上的伤痛，都使他回忆起这次战斗，都使他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关于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的教导。现在他怀着胜利的喜悦，也怀着昂扬的战斗意志，来到五班阵地。在浓烈的硝烟味里，战士们正在

用树枝隐蔽炮身，胡劲在抡大镐修整炮掩体，一个个精神抖擞。张大威眉宇间立刻露出笑容。他走上前去，和战士们握手，向战士们祝贺：

“同志们，你们五班打得好，在关键时刻，为祖国立了一功！”

“营长，怎么你也老提我那‘关键时刻’呀！”胡劲脸红红的，在首长面前第一次感到腼腆和不安。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志们，什么叫‘永远’，怎样才算‘战斗队’呢？”营长仍然挂着笑容，但问题提得十分严肃。

“营长，我懂了，对我们每个指战员来说，每时每刻都是‘关键时刻’！”胡劲斩钉截铁地回答了营长的问题。

张大威望着胡劲，望着五班每个战士。一个个刚强铁汉，在早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朝气蓬勃。张大威兴奋地笑着说道：

“胡劲同志说得对，说得好。为了祝贺我们的胜利，我讲一个故事，就给大家从头讲我那个‘关键时刻’吧。”

1971 年秋于襄阳

老 首 长

高建远一吃过晚饭，就匆匆朝团部走去。他决心要摆一摆老首长的架子，和小老孟好好谈一谈，今天上午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小老孟的批评，搞得他不疼不痒，整整一天，都觉得不是个滋味。“哼，这就是你对待我这个‘老首长’的态度呀！”心里憋着气，把个哼字从鼻腔里挤了出来。

小老孟是新上任的团参谋长，本名孟伟。论年龄，三十不挨边，长得挺精干，看模样更显年轻，叫个小孟恰当不过。论军龄，十年略有余，在部队进步快，文的文得，武的武得，叫个老孟也不过分。也许是有这两方面的因素吧，团里一些老点的同志就叫他小老孟。当然，老同志们并不像喝墨水长大的人那样喜欢咬文嚼字，只是很自然地感到叫个小老孟既亲切，又恰当。老同志这么叫着，难免不让战士们听到一回两回。他们不这样叫，却有时要分析分析：“为啥叫小老孟，就是跟战士一起像个战士，玩得来，跟首长一起像个首长，谈得拢。”不过，小老孟毕竟还带个小字，说话做事，也有叫老同志看不起眼的时候，今天对“帽子问题”的批评就是一例，惹得三营营长高建远生起气来。

上午八点十分，部队按预定时间入场完毕。孟伟拉开嗓门，亲自指挥整理队伍，口令喊得宏亮有力，部队动作也干净利落。“放凳子！”嘹的一声，如刀切一般齐。“坐下！”唰的一声，又如刀切一般齐。这口令，就好比是一个纺织工厂的电钮，三拨弄两拨弄，整个部队纺成了一根根平行的经线和纬线，织出了一面巨幅的绿锦，锦面上整齐地镶嵌着一颗颗小红星，一对对小红旗，庄重地铺展在大操场上。

高建远参加“三支两军”两年多了，前不久才回到部队，此刻他品味着这严肃紧张的军事生活，心都陶醉了。他不禁想起“七分口令，三分动作”这句口头语，小老孟的这两下子，真不简单呐！心里暗暗高兴。

时值秋末冬初，部队开始按冬季着装。孟伟等部队坐定，两眼闪电般地扫视全场，在一色赤褐色栽绒帽中间，夹着一顶绿色单帽，他眼里像飞进一粒砂子，直发胀。

“同志们！冬训马上开始，今天开个动员大会。我先讲几句。”孟伟站在前

面，语气带有几分严肃地说，“昨天团司令部通知，二十四点以后，也就是今天零点开始按冬季着装。可是现在，”他抬起左臂，看看表，语气由严肃变得有些激动，“现在是八点一十七分！还有戴单帽的！哪个分队的我不清楚，但是……”

每个熟悉孟伟讲话路子的干部都会想到，在这个“但是”的后面，就是：“有一条很清楚，干部工作不过细，没有尽到职责，说严重点，就是失职，应该批评干部。”他有两个例子是经常要讲的：唱歌的唱不齐，不怪唱的人，要从指挥艺术上找问题。打仗时，规定每个人左臂系白毛巾，有个战士没有系，或者系到右臂上，干部马虎过去了，就可能造成联络不上，甚至误会。执行命令是不能打折扣的。没有统一的行动，就不能打胜仗，指挥员的每点疏忽，在战场上就要用无谓的牺牲来补偿。孟伟从许多老干部那里，学会遇事要抓干部，有了问题要从干部身上找原因。他们的老首长高建远平时就是这样做的。

场上静悄悄的。没有刮风，四周的白杨树伫立着，摆出一副用心听讲又很自在的姿态。在座的一些干部，心情却不很平静，“会不会是自己分队的事呢？”但又不便扭头去看。就在孟伟的“但是”出口时，一个干部站起来：

“报告参谋长同志，戴单帽的是我们营的，请批评我们。”

孟伟侧转过身来一看，三营营长高建远立正站着。戴单帽的是三营的一名驭手，昨晚在马棚值班，没有听到通知。集合时，营长发现他戴着单帽，但入场时间快到，没让他去换。这会儿，高建远两眼注视着参谋长，诚恳地期待批评。

参谋长和营长的目光相遇了。孟伟仿佛坐汽车陡然下坡，心猛地往上提了一下，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为一顶单帽，把老首长请了起来。他的目光没有在营长身上久停，迅速转过头，两手不由自主地掏了掏上衣口袋，又转过脸，向营长说了句“请坐下”，又说：“这个问题今后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声音低沉，好像“但是”后面的一串话堵住了喉咙口。接着，孟伟转了话题，请团首长作报告。

高建远坐下来，很不自在地想，一向火力很猛的小老孟，今天批评人卡了壳，这是啥讲究？想着想着，气就来了。你小老孟想的啥呀？“但是……但是今天没按规定着装的是三营，三营营长是我们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老营长，一句话，是我的老首长，年纪比我大，资格比我老，我不能批评他，你们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老，老，老，你小老孟就把我当成老虎屁股摸不得呀？

要说孟伟把高建远想象成老虎屁股摸不得，也不是这个情况。但他确实想到，高建远是自己的老首长。

一般说来，“老首长”是用来称呼很有一把年纪的老干部，或者一直是自己的上级领导。高建远过去一直是孟伟的上级，近两年来，他们平起平坐了，现在

孟伟又成了老高的上级。自从有了这些变化，孟伟不再用职务来称呼老高，而总是尊敬地叫高建远是老首长。

老首长年纪不老，四十挂零。面赤黑，眉深浓，眼锋利。这是照例的外貌描写。不过他那脾气，很难描写得这般准确。初见面的说他严肃、严峻、严厉，有一股说一不二的气势。相处一天，两天，至多三五天吧，种种事情叫你感到不完全是那样，办事也好商量，对人也很有体贴，自自然然觉得这种人可亲、可敬、可爱。这大概是在革命部队泡大的同志一种特有的性格吧。

高建远抗美援朝时参军，打过几仗，据说档案里有好几张立功卡片，平时没人听他讲过这些事。他在地方一个大厂子“支左”时，担任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工作干得很出色，很受群众欢迎。有一回，厂报道组想写个东西登报，问他过去立过几次功，受过几次奖，他笑了笑说：“这哪记得清呀！我们天天为党干工作，为人民做事情，天天都记功，干一天工作填张卡片，做一件事填张卡片，加起来就是几箱子、几袋子，背在身上还能走得动路呀！”报道组的同志觉得这立功受奖的事，让他自己谈确实有困难，不如挖一挖他的思想境界，又问他：“一九六二年，你还在当班长，和你同年入伍的同志当了连长、营长，你咋想的？一九六五年……”老高没等对方数落完，说：“我想都一样。”他说得轻描淡写的。

老高就是这么个人，难怪有人认为，这种人缺乏进取心。然而，他心里装着的却是一种很珍贵的东西。在他“支左”期间，有一些干部因为部队建设的需要，职务变动，也就是像某些人说的，又进步了。他还是营长。一次，有人对他说：“老高你要不出去‘支左’，也会动一动的。”这“动一动”的意思，不用解释，谁都会明白说的是啥，老高一听，却怔住了。他简直不理解这是鼓励，是惋惜，还是安慰。是我高建远看战友们提拔了，不服气？是我高建远看年轻人上去了，不顺眼？还是没有动到我高建远头上，想不通？老高感到，这一句话倒是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为做官而革命，还是为革命做好官。如果党现在给我高建远一副更重的担子挑，没二话说，再沉，咬着牙也要挑起来。革命需要嘛，干革命不能讲价钱嘛。如果党让我高建远再当十年八年营长，或者“动一动”，下去当个连长，能说这就不是革命需要吗？难道应该讲价钱吗？老高啊，如果你是为革命做好官的话，这种情况你就不会是咬着牙干，而是高高兴兴地干。是的，你靠党引着，靠群众搀着，走过了一段革命的路程，算是一个老同志了。但是，你要把资历当做资本，向党向人民伸手、讲价钱，你不去想革命还有多少事情要做，一心想着比别人多穿了几套军装，那你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这许许多多，高建远平时不止一次地想过了，此

刻他想着，为什么有人常常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兜圈子呢？他明显地意识到，这也是摆在革命者面前的一道严峻的考题。高建远决心把心里的话，对自己的同志说一说：“老同志，我看职务动不动，自己还是不操心的好。国家的前途，革命是不是后继有人，才是每个革命者天天要想的大事。我们是老同志，在这些方面，更应该多操些心啊。”老高说得很严肃，似乎有点伤感情，但是，他决不是抱怨同志把自己的觉悟看低而要自我表白一番，而是这些推心置腹的话必须向自己的同志说明白。老高就是这么个直性子，人说他是“半夜开窗——星（心）挂在外头”，有啥心思都要亮出来，有啥话都要倒出来。

话扯远了一点。还是说说孟伟和高建远的关系。一九六二年，高建远到孟伟家乡去接兵，孟伟尺码斤两都够，可差一两岁。老高那时就可以叫老高，叫个孟伟这决心那保证地一磨，心也软了，就把孟伟带到部队，又要求留在自己班里。这件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也用不着再去追究。

一次边境反击战中，高建远班担任尖刀班，要拿下敌火力点，为全连前进打开一条通道。敌人碉堡进行疯狂射击，一排子弹朝孟伟飞来，老高用身体掩护了孟伟，自己受了重伤。孟伟抱住半昏迷的班长，一边包扎伤口，一边呼喊副班长，可副班长已经牺牲了。他看着老班长的血染红了泥土，抬头望见侵略者的碉堡还耀武扬威地立在祖国的土地上，心头充满着仇恨。“老班长，你放心吧，我替你指挥！碉堡一定要拔掉！”“我替你指挥！”这句话是个新战士说的，它有千斤重。老班长闪现出欣喜的目光，微微点头示意：“小孟，党信任你，祖国信任你！”孟伟让两个轻伤战士把班长背下阵地，自己扛着炸药包，带领三名战士，炸毁了敌碉堡。接着，全连冲上来，夺回了祖国神圣的土地。

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孟伟一次又一次接替高建远的职务。孟伟年轻一些，老高对他少不了要经常敲打敲打。孟伟当副营长时，有的连队，干部老一点，他就不常去指导，发现问题也不吭声。老高严肃地批评了这一点：“孟伟同志，党叫你当个副营长，绝不是把你摆在指挥员的位置上做陪衬。‘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毛主席早讲了嘛，为啥不照样做？我看是个态度问题。同志，你这不叫谦虚，也不是尊重老同志，是怕挑重担，对革命战争不负责任，这样反而疏远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辜负了老同志对你的希望！”在高建远心里，他喜欢孟伟“我替你指挥”这句话，只要孟伟稍有缩手缩脚，就不舒服，就要敲打敲打。他满意的是，孟伟接替他当营长以后，独当一面地工作，把个三营带得很像一回事。

前不久，高建远回到部队，干部部门征求他的意见，让他留团里帮助工作。正好这时孟伟调任团参谋长，因为三营暂缺营长，就没有到职。老高要求回三营

去，理由是全团冬训马上开始，好让孟伟早到职早挑重担。这一要求，很快得到师、团党委的同意。

这一回，是高建远接替孟伟的工作，孟伟心里自然有很多很多想法，老高回到营里一两天，孟伟却迟迟不交班。他不是怕老首长想不通，也不是担心今后难指挥三营，他从来没有朝这方面想过，老首长的心有多宽有多阔，他是知道的，但是思想总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堵住了，转不过弯来，他想了好久，想出一句话：“老首长，咱俩换换，你去……要不，我留在营里当副营长。”老高想不到孟伟竟说出这种傻话来，嘿嘿嘿地笑了一阵，又讲了一些道理，最后严肃地说：“你明天一定要去！”听那口气，看他拧紧的眉毛，似乎还想说：“你要不想走的话，我就开赶！”

第二天，孟伟只好上任，老高把背包抓过来背在自己身上，一直送他到团部。我们革命战士不习惯掉泪，就是在孟伟给老班长高建远包扎伤口的时候，他也没有掉滴泪。可这天，高建远回营里去时，孟伟紧紧握着老首长的手，眼睛湿润了，模糊了。

因为有上述这些根根底底，在今天上午的全团军人大会上，孟伟批评高建远就留了一手。老首长的脾气，他不是不知道，为啥要留这一手呢？事后想起来，一时也想不出这是为了啥。

就在高建远匆匆朝团部走的时候，孟伟吃完饭回到了宿舍。他拿起一条军裤，又从挂包里取出针线包，动手缝补昨天勘测战术演练地形时撕破的裤管。看到针线包，他想起十年前送这小宝贝的老班长高建远，又联想到今天的帽子问题，他分明看到老首长坐下以后神情很不愉快，样子是在生气。想到这一层，他心绪渐渐乱了，他缝上几针，就把军裤扔在床上。

孟伟面对窗外，他无意欣赏傍晚天空和山冈的美丽景色，只是凝神地站着，两只手在衣袋里掏来掏去，不停地把口袋盖翻上翻下。他思考问题大凡是这样，不背手踱步，也不闷头抽烟，仿佛能从口袋里掏出答案一般。尽管他没有抽烟的习惯，可一旦问题想出了眉目，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叫思想飞跃了，却特别想抽上一支半支。类似这些生活细节，高建远当然要比别人更为了解。老高走进参谋长宿舍门，见他背着身子在一个劲掏口袋，也不便打扰，就轻手轻脚地在床上坐了下来。

这是一间团首长的单人宿舍，由于孟伟的家当有限，这个本来不算大的房间显得过分宽敞。大棕床上，一条铺着白色床单的棉垫，只占用了棕床的二分之一，半边空着，棕绳网格袒露在外面。南面临窗的三斗桌上，散放着打开的书

籍、笔记本、地图册，还有摊开的新报纸，这和空荡荡的棕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床上放着的黄布针线包，是高建远亲手缝制的，十年多了，它还在！

营长被室内的一切吸引住了，倒忘了自己是带着任务而来。他随手拿起没有补完的军裤接着缝，脑子里映出了小老孟的好多优点来。要是几年前，他看到眼前的这些，会说孟伟是棵好苗苗，今天，他该夸孟伟是个好领导。顷刻间，这个房间在他眼前放大，长出了堑壕，听得见枪炮的呼啸。高建远的思想又飞回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指挥一个团、一个营作战，仗打得呱呱叫。现在想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唉，我们的小老孟，小老孟也不错嘛。

“哎哟！”营长想着缝着，手叫针扎了一下，但他没有“哎哟”出声来。“哎哟，现在又不是给我们小老孟评功表模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任务，想起了帽子问题，想起小老孟留那一手，搞得不疼不痒，很不过瘾。他来登门，一则汇报思想，二则少不了要敲打敲打。他个人认为，不说是“老首长”，就是“老班长”也有这份责任。你小老孟对我照顾情绪，我可不能对你照顾情绪哟。

老高憋不住了，点着一支烟，使劲吸了一口，屋子里顿时散发出馋人的香烟味。

“老首长！”孟伟不知道是思想飞跃了，还是被烟一熏，思绪飞跑了，停止掏口袋，回过头来，愣了一瞬，麻利地给高建远敬个礼。他当参谋长以后，碰到老高总是抢先敬礼。“老首长，你来得正好！给我支烟抽抽。”

老高在公开场合，总是一本正经地参谋长前参谋长后，在私下里，也爱像大哥哥逗小弟弟，说几句开心话。他见孟伟要烟抽，心里一动，掏出一支来，擎在手里摇晃：

“对不起，我不是你的后勤部长。”

“嘿，不给，算啥老首长！”孟伟在老高跟前，像个小战士，孩子气回潮了。他一把夺过烟。见老高又不肯给火柴，就一语双关地说：“嘿，不给火点，也别想我发扬火力啦，咱们都别想过瘾。”

经孟伟这么一点，问题倒是点穿了，原来在这个房间里的两个人，心里算的是同一道题。

“小老孟你真飞跃了？来，我给你点火！”老高兴奋地划着火柴，给他把烟点着了。

“好不容易才飞跃起来呀！——‘孟伟同志，党叫你当个参谋长，绝不是把你摆在指挥员的位置上做陪衬。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毛主席早讲了嘛，为啥不照样做？我看是个态度问题。同志，你这不叫谦虚，也不是尊重老同志，是怕挑重担，对革命战争不负责